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ERIODICALS

中国期刊

史

中国
历史

第一卷(1815—1911)

石 峰 主编 刘兰肖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ERIODICALS

中国期刊史

中国
期刊
史

第一卷(1815—1911)

石 峰 主编 刘兰肖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王 萍

封面设计：王红卫 赵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期刊史. 第一卷, 1815—1911 / 石峰 主编; 刘兰肖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01 - 017242 - 2

I. ①中… II. ①石… ②刘… III. ①期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815 - 1911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9607 号

中国期刊史 第一卷 (1815—1911)

ZHONGGUO QIKANSHI

石 峰 主编 刘兰肖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48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242 - 2 定价: 9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顾问：张伯海

主编：石 峰

撰稿人：刘兰肖 吴永贵 范继忠 李 频 段艳文 钱俊龙

编委会主任：石 峰

编委会副主任：余昌祥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 峰 刘兰肖 刘建生 孙 琇 李 频 肖 宏 吴永贵 余昌祥

张友元 张伯海 范继忠 侯正新 段艳文 姜长喜 钱俊龙 章新民

编委会办公室：刘晓玲 章 红

特约审稿：张伯海 刘建生 章新民

绪 论



石 峰

—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n Milne，1785—1822）和他的中国助手、刻字工梁发（1789—1855，又名梁亚发，广东肇庆人），在华人聚居的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 Magazine），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以华人为读者对象的中文期刊（亦可称为杂志）。后因米怜病重无人主持，该刊于1822年停刊，共出版八十多期。其主要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和伦理道德为主，同时介绍一些西方历史、地理、风俗和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也偶有新闻刊发。当时英国是近代报刊业出现较早的国家之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内容到形式都因袭了英国人所办刊物的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清代名医唐大烈编纂的《吴医汇讲》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期刊。《吴医汇讲》到清嘉庆六年（1801年）停止刻印出版，前后历时10年，共刊印11卷。《吴医汇讲》尽管有专业类期刊的一些元素，但尚不具备期刊的本质特征，从形式到内容更像文稿汇集的丛书，而且当时编者的主观意图也并不是当作期刊出版。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把《吴医汇讲》作为最早的中文期刊有些牵强。对此，刘兰肖博士在本史首卷中作了比较翔实的阐述，权当一家之言。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为标志，到2015年中文期刊已经走过了200年的历史。

纵观这 200 年,中文期刊的产生、发展以及曾经的波折不是孤立的,都与这 200 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期刊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体,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曾经出版的任何一种期刊都承载着大量社会发展变化的信息。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的第一个科技期刊《博学者杂志》(Jovrnal des Scavans)诞生于 1665 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刊物。16 世纪前后,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欧洲社会发生重大转折——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加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也极大地推动了法国的科技进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博学者杂志》的创办可谓应运而生,其水有源。

期刊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器,既能客观地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又能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因素做出一定程度的揭示,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在这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期刊和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滋养和磨砺下成长。因此,把 200 年来中文期刊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把期刊业的发展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之关联性揭示出来,把不同历史阶段的杰出办刊人的办刊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以总结,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期刊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总结期刊业的发展经验和规律,正确把握新时期期刊出版的舆论导向和发展方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自 20 世纪末以来,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期刊业形成强势冲击,期刊业的发展出现历史性拐点,期刊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这个新旧融合、交替的节点上来回顾过去、审视当下、展望未来,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由此,中国期刊协会产生了组织编撰《中国期刊史》的动议。

经过座谈访问,听取各方意见,明确了主旨思想,初步确定了要编撰一部什么样的期刊史的问题。同时,组建了长期从事期刊研究、以中年学者为主体的撰稿班子。张伯海老先生是业界公认的从事期刊出版研究的资深专家,在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期刊出版工作二十多年,虽年逾八旬,却始终为期刊业操心劳神,且颇有建树,编撰《中国期刊史》也是他的夙愿,特聘他为编撰顾问。

以 200 年历史时段编撰的这部《中国期刊史》,不仅意在客观、准确

地记录中国期刊曾经的发展历程，更想在科学总结我国期刊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历史经验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核心品质传递给新一代期刊人，以期在期刊的数字化变革中，步子走得更加坚定执着。

二

根据编撰《中国期刊史》的主旨思想，确定了《中国期刊史》的基本框架。全书近二百万字，分为五卷：

第一卷（1815—1911），自晚清到辛亥革命的期刊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期刊的萌生和初创期，重在探寻中国期刊生长的本土“基因”，由从事出版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刘兰肖博士撰稿。她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社会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试图回答中国期刊发展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疑惑和问题，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出版业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出版业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期刊的产生却比西方国家晚了约一百五十年？为什么第一本中文期刊是由外国人创办、在境外出版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期刊没能在中国如期出现？晚清时期中国期刊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作为期刊史都是回避不了的。刘兰肖博士从一个史学者的角度，纵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现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对西方列强的疯狂入侵和掠夺，对以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可歌可泣的抗争，以及近代中国人期刊观念的嬗变，都做了全面客观的评析，向读者呈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期刊成长的时代景象和历史风采，可谓艰难曲折。

中文期刊的真正兴起是在清王朝覆灭前的十几年。随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以及革命思潮的发展，民众日益觉醒，期刊成为仁人志士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期刊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和办刊人以及期刊业呈现的特征，本卷都做了详尽而客观的介绍。

第二卷(1911—1949),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期刊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风起云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革命斗争艰难曲折、但势不可挡,思想文化领域良莠共生、阵线分明,中国期刊的生态环境光怪陆离;而反映人民心声的进步期刊在夹缝中生长,其战斗性得到了充分洗礼,涌现出一批革命性、思想性、斗争性都很强的期刊和办刊人。该卷由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永贵博士撰稿。

辛亥革命以后,产生了一个具有这一时期标志性特征的刊物《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距离第一个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刊,正好是100年时间;而《青年杂志》的创刊到2015年中国传统期刊在数字化大潮中出现转折,又正好是100年。在这两个100年中,《新青年》在中国期刊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期刊在社会变革中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为人民群众拨云驱雾,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活力,无论是传播力、感召力、影响力都实现了一个大的提升与飞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处于社会大转折、大变动中,民族矛盾激化,军阀混战加剧,社会思潮四起,为期刊业的发展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晚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有崇尚“清议”的传统,也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形式。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议论国是,对社会现象高谈阔论,对人对事品头论足,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使他们意识到“清议”不能救国。于是他们从西方报刊舆论的影响力中得到启发,纷纷投身办报办刊,以扩大自我政见的社会影响。这是知识分子阶层以言论影响政治的一种自我觉醒和升华,也是中国舆论形式的一次大转折。

期刊的“战斗性”日益彰显,是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一卷中,吴永贵博士在深入分析当时社会背景和政治流变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在解放区和“白区”创办的较有影响的期刊,特别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革命先驱直接参与创办的期刊和杰出的办刊人都做了全面介绍,同时还原了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的独特现象。当然,社会是多元的,对期刊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流派和性质的期

刊，作者也择其要者进行客观评介，包括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刊物，以反映当时期刊出版的生态和原貌。

第三卷（1949—1978），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期刊历史。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期刊的重建和探索阶段，是为新中国期刊业定性、定调、定方向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期刊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也经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经验和教训都极其深刻。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所留下的印迹，可以说至少影响了两代期刊人。该卷由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外出版文化史的专家范继忠博士撰稿。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清除腐朽的上层建筑，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新体系，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题，一切“从新”成为这一时期最耀眼的主题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期刊业，既要承接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期刊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要“再造”一个全新的期刊业。范继忠博士把新中国之初期刊业的这个“再造”过程，称之为新中国期刊业的“奠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社会舆论的独特作用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深谙包括期刊在内的出版工作在新中国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建立新中国的千头万绪中，即对新生的出版事业进行了精心部署。1949年2月成立了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着手设计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制和布局。同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天，该委员会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同志在开幕讲话中，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条变成现实。这次会议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在方向上、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奠定了基础。会议结束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并于11月1日召开出版总署成立大会。与此同时，10月25日《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文学刊物，毛泽东主席为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1月15日《新华月报》创刊，毛

主席为之题写刊名。这一切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出版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怀。

1950年9月,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的第一届出版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改进期刊出版工作的决议》;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出版发行工作的规定》,这对中国的期刊出版工作而言,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同时,有关管理部门还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如不允许成立私营出版机构,期刊定价不得有地区差价,期刊只能交邮政发行,等等。回顾这一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对期刊业的种种规范和要求,对社会主义期刊事业来说,有的是带根本性的,至今仍需坚持;有的是为巩固新政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或政治运动使然,是阶段性的,须与时俱进;也有对期刊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期刊的市场属性尊重不够带来的缺憾,这在探索社会主义期刊事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需要多维度地去考察。

胡愈之先生是新中国期刊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对旧中国期刊业进行的整合改造,对新中国期刊业发展方向的确立和体制的建立,对新型期刊业运行机制的规范和扶植政策的制定,以及亲自主持创办《新华月报》的实践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的出版理论建树和办刊思想、办刊实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许多刊物,直到今天仍有较大影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逐步形成的“中国”“中华”“人民”等字头的系列期刊,成为新中国期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党刊系列,至今仍是推进党的建设和解读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地方刊物也曾伴随新中国的脚步得到了长足发展。对这一时期我国期刊业发展的脉络和经历的曲折,范继忠博士也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刊物,书中也做了客观描述。而因政治、经济因素造成的期刊出版大起大落现象,作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以求留下前车之鉴。至于“文化大革命”对期刊业造成的损害,作者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第四卷(1978—2015),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跨越近四十年的

期刊历史。这一时期的中国期刊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沉淀，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带动下，发展过程尽管有起伏，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期刊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事业最充分的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启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的新时代，期刊业开始了新的征程。期刊品种由1978年的930种增加到2015年的10014种，总印数由1978年的7.62亿册增加到2015年的28.78亿册（2012年曾达到33.48亿册的峰值）。这一部分由李频博士撰稿。李频博士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期刊，二十多年来始终站在文化体制改革前沿跟踪我国期刊业的改革发展，时有新鲜观点与业界分享，并出版了《共和国期刊60年》一书。他对这一时期的期刊发展走势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期刊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一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平稳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虽说这种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由自主地带来悄然而深刻的变化。期刊出版也不例外，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构改革等，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都对期刊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后首先着力的方面，而且持续深入、跨步前行。从承包制到绩效挂钩，从鼓励个体经营到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从确立市场主体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全方位的渐进式的颠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这个目标的逐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无一例外地都将经历深刻变革。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虽然有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但同样要经过市场环节才能发挥其功能，它的商品属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期刊经营也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走进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这就要求期刊从业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在确保党的领导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模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认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它作为我们认识当前社会矛盾、制定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此又出现了社会思潮、利益诉求空前活跃。而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矛盾空前凸显,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加紧迫而艰巨。执政为民理念深入人心,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又增加了社会工作的复杂性。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期刊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的传播载体,从指导思想到刊载内容都必须进行调整和创新。

第四是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首先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是这一时期期刊出版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进,文化领域的改革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化工作的体制机制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成为期刊出版舆论导向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激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更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到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新境界。期刊出版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期刊业的改革发展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了。

第五是媒体格局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数字技术借助互联网在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形态的媒体应运而生,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冲击之猛,出乎人们的想象。媒体格局的变化,传统媒体面临新的严峻考验,有人甚至用“柯达”的终结来警告传统媒体的未来。但是,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传统媒体带来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整合内容资源,创新传播形式,提升传播速度,扩大传播范围,等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将给传统媒体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这些变化对期刊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李频博士对改革开放以后期刊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对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的轨迹和概貌做了清晰的描述,对新时期出现的期刊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期刊业呈现的独特景象,他认为在世界期刊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很有研究价值,为此他做了重点介绍。尤其是对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若干期刊,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用较大的篇幅进行剖析,以期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或者启示。有的期刊情况较为复杂,是非曲直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记录下来,以便后人研究思考。

这一时期期刊业的发展也不平静。1985年针对出版物庸俗化倾向,对包括期刊在内的出版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1989年针对“自由化”问题在报刊中的表现,又对全国报刊进行了清理和压缩;2003年为减轻基层和农民订阅报刊的负担,整合停办了一批利用权力摊派发行的报刊。这三次报刊的治理整顿,对端正报刊出版工作方向、规范报刊出版秩序、改善报刊经营环境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李频博士对2003年的报刊治理整顿进行了初步剖析。

第五卷为中国期刊发展纪事。这一卷是为了丰富《中国期刊史》的史料性,弥补书中的缺漏而安排的。这一卷由《中国期刊年鉴》主编、期刊创刊号收藏爱好者段艳文先生整理编撰。他采用编年体条目形式记录了中国期刊200年的发展脉络,并对期刊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策、法规、人物、事件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述。《纪事》是《中国期刊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拟议本书编撰结构时,曾设想科技期刊单独立卷。科技期刊是我国期刊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在我国期刊史上影响深远,在中国期刊早期发展阶段,随着“西学东渐”的兴起,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推动下,首先影响中国的是科技知识、科学理念。其间,科技期刊发挥了媒介的应有作用,可以说,我国早期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要超过其他门类的期

刊。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成为当时主流社会舆论,随之与其相适应的各门类期刊迅速崛起,但科技期刊始终占有半壁江山,很多科技期刊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1912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发表了我国杰出工程师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不仅首次为在我国复杂环境中修筑铁路提供了经验资料,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办铁路的信心。又如1915年由留学美国的任鸿隽、杨杏佛等为发起人创办的《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就发出“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的呼唤,振聋发聩,并大量发表海内外学子探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不同观点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的发展,1950年中国科学院就创办了《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科学记录》(外文版)等,随后又创办了《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等十几种科技期刊。1963年、1965年国家两次召开科技出版工作会议,对科技期刊出版工作予以特别关注,促使一大批科技期刊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新春气象。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引下,科技期刊如沐雨露茁壮成长,逐步形成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华医学会、中国高校四大科技期刊集群,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的科技期刊体系,各类科技期刊始终占全部期刊品种的50%左右。科技期刊的不断发展,对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增强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资料表明,我国科技人员从期刊中获取的科技情报占整个情报信息来源的70%—80%,有的学科占比更高。特别是在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方面,科技期刊更是功不可没。曾经有人提出科技期刊在《中国期刊史》中应独立成卷,考虑到这部《中国期刊史》编撰体例的因素,科技期刊在各个阶段的发展背景与其他类别期刊的发展背景基本类似,单独立卷多有重复之虞。因此,决定把科技期刊按四个发展阶段穿插在其中,以体现《中国期刊史》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但是从结果来看,在本书中科技期刊的分量明显不足,科技期刊的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此,单独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史》也是值得期待的。

为了使科技期刊在本书中得到应有的反映，特聘请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副理事长、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历史研究有素的专家钱俊龙先生撰稿，提供给各卷主撰人参考选用。钱俊龙先生也为《中国期刊史》的成书作出了可贵贡献。

三

这部《中国期刊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期刊200年的发展历程。从1815年第一本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到2015年本书基本截稿，整整200年。这部《中国期刊史》通过对不同时期期刊发展状况的综合叙述，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的深入介绍，对一些不同凡响期刊事件的粗略回顾，较完整地再现了中国期刊200年的发展面貌。本书近二百万字的篇幅，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涉及期刊的事件、人物以及期刊的发展状态都有足够的笔墨进行描述。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期刊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期刊业经历体制转型和媒体形态转型的双重考验，是中国期刊发展史上最精彩的阶段，值得人们去关注。在编撰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对敏感时期的期刊发展状况也有客观的阐述。200年来中国期刊业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恰如一幅重峦叠嶂的“画卷”。当然，“全景式”只是一种比喻，在这一“画卷”中，疏漏还很多，“景色”还不尽如人意。

二、“居高临下”观察中国期刊业的发展轨迹。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首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景说理，耐人寻味。观察期刊业的发展史何尝不是这样，必须跳出期刊业才能看清期刊业的发展轨迹，即所谓要“居高临下”。“居高”，第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把期刊业的发展放到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分析。时代潮流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期刊业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长的，研究期刊史就要研究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上，有哪些期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产生过什么作用。第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高度。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涉及期刊业发展的重大事件,必须从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思潮的兴起、阶级矛盾的变化等方面,去剖析其中的原因,否则就可能缘木求鱼。第三是站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去判断一个刊、一件事、一个办刊人的是非曲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看待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第四是站在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斗争的高度,观察期刊界的风起云涌。期刊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任何一次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都会在期刊上反映出来,回眸期刊业的发展历史不能少了这根弦。这是《中国期刊史》撰稿过程中把握的几个重要原则。由于有这些原则的指导,使200年来我国期刊业的发展主线清晰、是非分明,也使本期刊史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三、史、论并茂,是《中国期刊史》始终所追求的。客观记载、诠释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称之为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作为一部《中国期刊史》,主要应该把中国期刊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客观地记录下来,包括代表我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刊物,以及相关的背景、人物、事件、物件等等。然而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不是客观事物的堆砌,写历史也不是记流水账,史学工作者必须赋予它深刻的思想、鲜明的观点、有益的启迪,这样的历史才立得起来,这样的史书才可为后人提供借鉴。所以,撰写《中国期刊史》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史实要可靠准确,史料要翔实充分,评价要客观公正,观点要正确鲜明。纵观全书,这一点虽然仍有欠缺,但也可以说基本达到了,至少可以说撰稿人努力了。

四、点与面结合。这里所说的“点”,即个案,它表现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刊物、一个典型的办刊人、一个涉刊的重大事件,或者一个时段、一个地区的刊物状况等。全书涉及的刊物大约有上千种,其中一个刊物用一章或一节的篇幅加以介绍的就有一百多种;涉及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办刊人也有几十位,其中梁启超、章士钊、邹韬奋、储安平、胡愈之等做了重点记述;涉刊的大小事件不少,贯穿全书。所谓“面”,即对一个时期、一个发展阶段或一个区域、一个类别期刊的综合性、概括性的记载、论述,这是《中国期刊史》的筋骨,有粗有细、有详有略。本书除了开篇

有一个“绪论”外，每卷开头都有一个“导言”，对四个阶段期刊业发展的背景、特点等进行概括性的分析交代，起到“纲”的作用，纲举目张。

五、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史书一般都板着面孔说话，缺乏亲近感，如何让史书“活”起来，也是《中国期刊史》追求的目标之一。史书要有学术性是毋庸置疑的，要有严谨的理论表达，要有独到的创新见解，要有科学的求证方法。有一部分学术著作很难兼顾通俗性，这也不难理解。但是作为一部期刊的专业史书，则完全可以也应该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统一。中国期刊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有神奇色彩，一个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的文明古国的第一本中文期刊居然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一本影响巨大刊物名称的由来、一个建树非凡期刊主编的人生经历、一个非同寻常涉刊事件的背后都可能蕴含传奇故事，把它挖掘出来，都会给《中国期刊史》增色。本书的撰稿人都是做研究工作的，学术性基本上没有问题，难在通俗化。为了增强《中国期刊史》的可读性，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始终强调，从内容设计到史实表述，都要尽可能做到好读、好懂，多讲故事、多加插图，使枯燥的内容形象化。在这方面，可以说大家都努力了，但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全书的插图，还应该做得更好些。

四

期刊作为一种传媒、一种信息载体，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创办，都有其自身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但它毕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必然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刻影响。因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创办的期刊，又必然有其不同的特征。中国期刊业经过整整 200 年的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成长，特别是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和考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基本特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政党，我国的期刊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